

吳承仕文錄

吳檢齋遺書

吴纆斋遗书

吴承仕文录

吴承仕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07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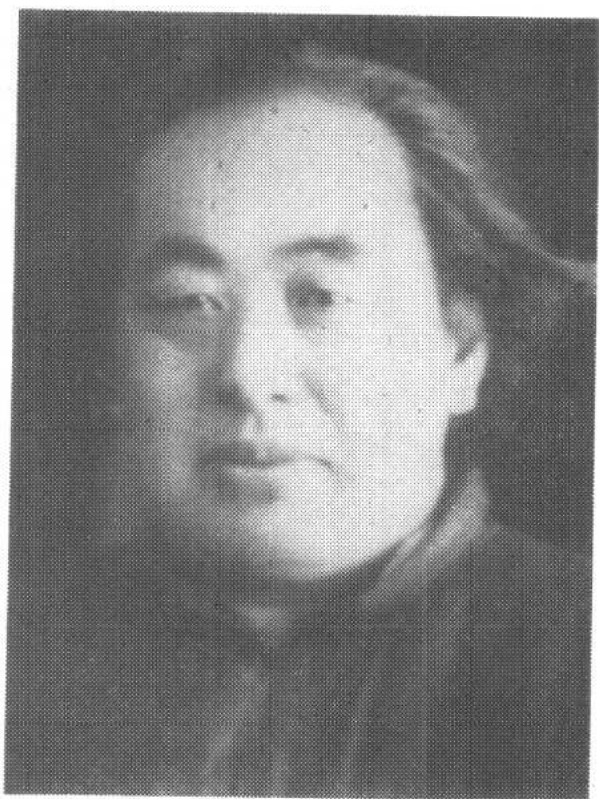
20960733

吴绳斋遗书  
**吴承仕文录**  
吴承仕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96千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统一书号：11243·7 定价：1.20元



吴承仕像

何少山先生忘日祭文

芒。日。禹。甸。神。吸。奥。區。滿。天。獨。夏。在。修。光。祥。容。惟。我。公。奮。迹。南。土。糾。
 會。我。後。攘。除。建。虜。惟。嘉。帝。有。毒。惟。歎。本。有。藥。竊。國。毀。修。相。尋。慶。撥。
 歸。命。白。帝。若。狼。与。獨。恚。索。敵。行。何。阻。僧。公。守。心。一。怒。而。去。開。
 府。百。身。与。九。族。拒。木。非。道。阻。天。罰。我。有。齊。斧。非。敵。
 惟。友。曰。亦。燥。怒。割。紫。未。羊。中。道。崩。殒。三。時。五。夜。版。而。棄。若。土。首。哀。
 今。之。人。不。怕。我。侮。彼。如。豺。虎。我。以。走。狗。繫。蒼。牛。願。啗。我。肺。腸。鬼。伯。
 森。門。人。命。不。長。兮。聖。未。沫。疾。如。疾。首。如。楫。非。曾。六。孔。之。醜。披。七。抗。
 敵。心。死。有。責。禮。本。命。戴。五。方。策。河。山。常。禍。眾。志。成。城。烹。臧。島。夷。
 拯。我。天。靈。武。勝。衣。冠。攀。尊。莫。及。人。心。不。死。氏。族。无。極。尚。享。

附贈龍學居侯子舟

其錄仁弟必見于大册中任錄之事已也馬主任  
切商當往者來僕亦從經與有錄政體近心修  
補付中而命至西半後之條也貴高古近遊修  
芝下初校校稿宜審慎宜速也後校則僕自任  
之校也呈示已有經驗當亦也且之禮不如此  
如書略情本校于字為宜此以

近好二字仕有 七月十三日

西單南門里 一拜

齊振名先生

## 吴缙斋遗书编纂缘起

吴承仕（一八八四——一九三九），字缙斋（一作检斋），安徽歙县昌溪人。清末举人，曾应举贡会考，殿试录取一等第一名，分发为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后任司法部佥事。受业于章炳麟，专治经学、小学，对历代典章名物及文字音韵诸学有深入研究，著述甚多，在学术上具有很大的成就。曾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先后任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多年。晚年值抗日战争爆发，深为祖国危难存亡而焦虑，毅然投入救亡运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受日本侵略者迫害，不幸染病致死。

吴承仕无愧为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老学者，一位令人崇敬和怀念的老革命家。为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特将其遗著编订为《吴缙斋遗书》，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纪念吴承仕诞生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

## 代序

### 忆我的老师和同志吴承仕

张致祥

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常常有一些表面现象，或者一些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的事情，障碍着彼此的了解。只有透过表面现象的迷雾，理解一些事情之所以产生，才能促进互相了解。我和吴承仕之间，就是由不了解甚至误解和隔阂而成为亲密的师生和同志的。

吴承仕，字检斋，安徽歙县人，一八八四年生，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平逝世。他和黄侃（季刚）、钱玄同，都是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精研音韵训诂和古代名物制度，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兼任教授。他同在南京中央大学教学的黄季刚有「北吴南黄」、南北两经学大师之称。章太炎对他们的学问是称道的，在章给吴的书札里对吴的《经籍旧音辨证》说：「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核实。」章还对吴和黄作了这样的比较，说吴「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

我认识吴检斋，是在一九二九年秋考进中国大学国学系三年级之后。我之所以投考国学系，与其说是慕检斋先生经学大师的盛名，还不如说觉得国学系好考点。由于我并不想钻到故纸堆里去，再



加上自己的幼稚，我同检斋先生之间就产生了一段纠葛、误解。

为了投考，我读过先生的讲义，入学后，亲身听了他的《经典释文叙录疏证》等课程。第一次课堂上他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位浑厚、和蔼，受人敬爱的老师，又是精于治学的学者。他身材伟岸，在宽宽的脸颊上戴着老花镜。虽然当时他才四十多岁，但讲课看讲义时，把眼镜架到额上，头的前部发已微秃，脑后长发披到颈部，嘴里叼着烟斗。他很注意讲授方法，常常用提问、比喻来引起学生的兴趣。

我在听了国学系的其他诸如说文、诗词、金石、校勘等课程，愈益了解「国学」内容之后，就愈益对国学系不满。我想如果时间退回十多年，就一个私立大学的条件来说，应当算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系，但是，现在毕竟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当时我对检斋先生的为人并不了解，例如，他对以大勋章作扇坠到总统府痛斥袁世凯，被袁幽禁在龙泉寺的章太炎，曾不避嫌疑，亲自去探视送饭，张作霖残杀李大钊同志以后，他愤然辞去司法部金事职务。这些都足以说明他关心时事、正义凛然，我却以为他甘心呆在象牙之塔里，落伍了。他为什么不在旧学之外设些新文学课程呢？我没有采取去找先生恳谈的办法，而是串连了一些与我有同感的同学，对一些不合意的课程的老师，采取了拒绝听课的幼稚行动。使某些老师上课时，课堂里只有空空的桌椅。这样，有几位讲师因此不得不辞职，而先生一方面由于他的民主办学的精神，接受了我们增设近代文艺思潮等新文学课程的要求，另一方面却为此很伤了心。私立大学教员薪资微薄，他好不容易把人请来，却被我们轰走了。他是极重友情的，怎么对得起那些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经他再三敦请才来讲学的友人，今后又怎样请得

动别人？记得有一次我去找他提出课程改革要求时，他有好一会口噤而手微颤。他对我这个带头肇事学生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我没有尊重他，和他谈谈心，至今我还为自己当时的幼稚感到愧作。

我们师生之间的隔阂，是在我离校之后的两三年才消除的。历史对极少数人是严厉的审判官，而对绝大多数人是循循善诱的老师。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共，日本帝国主义不费吹灰之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工农红军第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有这些事件，都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不能不激起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反动当局的愤慨，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不是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九三三年的暑假，检斋先生的得意弟子、在保定任教的齐燕铭回京度假，他照例去探望吴老师。先生向齐诉说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谈到办国学系的困难，对我这样一些学生为什么不体谅他办学的辛苦、不好好学习，感到困惑。齐用切身体会向先生介绍了保定学运情况和学生不能安心读书的原因，并向他介绍了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译作和反映苏联新社会的出版物（据现在所记得的有《反杜林论》、《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等）。他们谈得很投机，从此，检斋先生以钻研经学、文字学、训诂的严肃态度，来研读当时可能买到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并且象读古籍一样，在这些书上用蝇头小楷的眉批，写上自己的心得体会。马列主义的真理打开了他的心扉，他以为之指南，根据他的「六经皆史」的见解，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究古代历史，改写他的讲义；并且开始重新剖析时势，从忧虑失望、无能为力状态中摆脱出来，找

到努力的方向和希望。他懂得了认识客观世界，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的道理。正象他在一九三六年《关于华北的非常时期教育问题》一文中，用他自己的语言所说的：「我们认识历史，同时更认识历史的任务」，「以认识促进实践，同时即以实践促进认识」。这在先生来说，是思想上一个质的飞跃。这里附带说一声，检斋先生从此也开始理解和谅解了我在学校中的年轻幼稚。

上述情况，是燕铭事后对我讲的。遗憾的是，燕铭同志已经去世，无从请他记述当时他们谈话的详情了。检斋先生用毛笔写上眉批的那些社会科学读物和他改写的讲义，几经浩劫，也已荡然无存了。

「以认识促进实践，同时即以实践促进认识。」先生的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不尚空谈，而注重身体力行。

他对自己二十年来的所从事的学问，作了这样的反省：「我是浸淫于所谓『正统经学、小学』的很小范围中、费时甚多、心得较少的一人」，希望今后能用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从事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他确实作了力所能及的尝试和努力，有他改写的讲义《三礼名物》等，有在这个集子中所搜集到的有关周代封建制与井田制、丧服、语言文字等的论著为证。

他主动改革课程设置，一九三四年以后，陆续增设了陈伯达的周秦诸子、曹靖华的新俄文学选读、高滔的西洋文学史、齐燕铭的中国通史等，并且还明确规定将别系的课程如李达的唯物辩证

法、黄松龄的政治经济学、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列为国学系的选修课。他从沉溺于正统的经学小学，转变到提出：「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御用化的政治经济学，宗教化的神学、形而上学等，这些历史资料，不妨留待将来的专门家去整理和批判，暂时只有束之高阁罢了」。这是一个革命的转变。当然，他这些话也是针对当时的「读书救国论」者讲的。他的实践，还表现于他自己出资创办《文史》。这既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部分中国古代史的尝试，也是他企图以此影响文史界的尝试。《文史》的编辑、印刷、校对、发行，得到燕铭的大力协助。先生也约我写稿，我们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直到后来发展成为过从甚密的同志关系。

日寇入侵越急，国民党当局越反动，象《文史》这样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刊物，只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了。《文史》停刊后，一九三五年的一天，先生约了燕铭到我家，提出办一个杂文为主的刊物，定名为《盍旦》。他讲了「相彼盍旦，尚犹患之」，出自《礼记·坊记》，「盍旦」，郑玄注，「夜鸣求旦之鸟也」。既然渴望黎明，就要为迎接黎明而鸣。我们都同意这个命名。当时因燕铭为《文史》奔走，已被敌特注意，决定由我出名担任主编。约定在每期集稿前开个会，议论时事，并商定大家写些什么和怎样约稿。这样的集会主要在我家里，有时也在先生家里开。

现在我只记得先生在这样的聚会中谈的两件事了。一件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竭力叫嚣「攘外必须安内」，为自己对日一再屈膝投降辩解，并捏造许多谣言，诬蔑我们党和红军杀人如麻，是「共匪」，为他们的反动「剿共」政策找依据。限于当时北平的条件，先生说，正面驳斥有困难，

想借用「张献忠杀尽四川人」和「黄巢杀人八百万」这样传说，以史实来驳斥它的荒谬，让人们懂得统治者以怎样伎俩来诬蔑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物的，懂得在这些反动宣传面前，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历史真实。先生的《张献忠究竟杀了若干人？》一文，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下面写的。二是，他痛恨迷信和宿命论，常同我们闲谈起迷信之不足信，以求签、卜卦为例说，百有九十九言不中，人们对九十九不中常常淡忘了，偶而言中，就到处讲「真灵」。当权者正利用人们的愚昧、迷信、宿命观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用这种鸦片来毒害人民大众。他为此写了好几篇杂文，来批判宗教和迷信。鲁方明（余修）在中大上学时，曾慕检师书法，求为题词，检师为他写下这样的立轴：「黑渊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地上架屋官立祠。龙不神，人神之。」也是讲的本无神龙，人们所膜拜的，正是人们自己所树立的偶像。

《盍旦》也只办了一年就寿终正寝了。一九三六年，黄松龄邀了一些同志到他家，先生、燕铭和我都去了，大家商谈出个《时代文化》的刊物，先生有好几篇文章是登在这个刊物上的。

先生不仅是写讲义和稿件，更重要的是他走出书斋课堂，到社会中去。一二·九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他，他站在进步教授的行列，参加了这个运动，一九三六年还去学生的夏令营讲话。「塘沽协定」、「冀东自治」，日寇的势力已伸进古都北平，它在前门一带利用日本浪人开设了大量的烟窟、赌场。先生为了揭露日寇的毒化阴谋和当局的软弱媚敌，亲自去冒险「观光」。「左联」解散以后，他积极参加北平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平，找不到会场，是先生出面

借宣武门内的「鸿春楼」饭庄开的成立会。

极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六年暑假，中国大学招考新生，先生向燕铭和我倡议，利用国文试题由国学系出，判卷由国学系判这个有利条件，拟好恰当的试题，用来考察考生的政治思想，好的给以高分，使他可能考取。因为不管考什么系，国文是主课之一。他针对时局，拟了「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的作文题。他约了我一同判卷（我当时已在中大任教）。那年夏天天气温很高，他不可避免，一边挥扇，一边阅卷。有时我们两人交换看看，作些评议。当时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其中有些转而投考中大，被录取了。黄诚同志（在皖南事变后牺牲）就是一个。

另一件，他亲自参加了中大的驱祁倒王运动。一二·九运动后，清华大学这个学运中心遭到镇压。为了使中大成为中心之一，必须驱逐把持中大、勾结警宪镇压学生救亡运动的校长祁大鹏，而祁又是校长王正廷的代理人，驱祁等于倒王。中大学生会请示党组织后，由史立德同志检斋先生和黄松龄商量，请吴、黄以系主任身份和学生会配合进行这一斗争。当时党的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还专门为此拜访了检斋先生。乘王正廷外交部长下台改任驻美大使，出国前到北平来安排中大校务的机会，驱祁的斗争揭开了。先生为此专门在东交民巷德国饭店租了一间房，要我住在那里，以便同学生会互通消息，商量斗争的部署和策略。当时利用中大常务董事会会长何其巩同西北军有旧，宋哲元、秦德纯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而何其巩又不甘寂寞，想借中大为阶梯重新上台这些因素，决定在驱祁倒王后，让何担任校长。一天，先生和我一同到何其巩家里，还和中大其他人，向

他表示欢迎他长校，但提出一个条件，希望他长校之后，应看到国难深重，保护学生救亡运动。何允诺了。驱祁倒王胜利之后，中大成为北平活跃的学运中心之一。

北平作协是北平各界救国会的成员。先生经常参加北平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初，北平党组织吸收检斋先生为特别党员，把他和燕铭、我编为一个特别小组。作些文化教育界的工作，由我任组长。从此，在我们的师生关系之外，又添了一层亲密的同志关系。

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二十九军进行了抵抗，我们都很激动兴奋，为二十九军将士募捐慰劳。但仅仅隔了一夜，清晨一看，北平所有街道的路口，军警都撤光了，只留下空荡荡的街垒，大家由不得热泪盈眶。不久，日寇举行了入城仪式。检斋、燕铭、我相约离家到各自的亲朋友暂时躲避。北平沦陷，已不能呆了，我们请示了组织待平津通车后出走。陈伯达约了检斋和我在平津通车后第二天一起去天津。到津后，先生和我同住在旧英租界小白楼一家白俄的公寓里。第二天，组织上决定我留在天津办油印小报。从此我和先生就一起住在天津。后来我主编了《时代周刊》（油印刊物），先生有时写些稿子。杨秀峰、张友渔等稍后也经天津南下，在刘清扬家开了个会，根据组织的决定，宣布华北各界救国会结束，另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开始了敌后地下的新的斗争。先生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先生五十多了，还带了家口，参加活动不便，只由我同他联系，给他送刊物，谈谈形势。一九三八年底，组织决定我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让我征求先生关于去留的意见。当时大家都不切实了解根据地的情况，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能否适应战争环境，确有顾

慮，先生也頗躊躇，怕自己不适应，又给组织添麻烦，最后决定留津不走。当我离津前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多年的师生之谊和同志之情，分手在即，别后天各一方，难定何日重逢，虽然互道珍重、勉励，有时仍不免相对无言，黯然神伤！

一九四〇年，我在根据地听到先生惨遭日寇残害的消息，稍后才知道他是一九三九年天津水灾之后，贫病交加，不得不回到北平，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听说日寇曾多次诱迫他出来，都遭到峻拒，足见先生晚节凛然！检师体质本不错，可以为党为人民作更多贡献，但终于不幸早逝，日寇和反动派是难辞其罪责的。

先生出身于殷实的家庭，清末举人，一九〇七年（光绪丁未年）朝考一等第一名，近代经学大师，有名望，不愁柴米，怎么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人呢？看来似乎难以解答，但依我的分析，不难找到他转变的轨迹。我的答案的根据是：一、他的高贵品德；二、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传播；三、中国的中外反面教员给人们上的课。

检斋先生，严肃、认真、正直。人最贵严肃、认真。他治学如此，行事也如此。当他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以后，就把全身心放在革命事业上，务期做出他力所能及的贡献。遇事全力以赴，一丝不苟。他曾目睹当局的腐败残暴，出于正义，愤然辞官，埋首于经学，当时可能有些避世之想吧。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你想逃避它，它却无时无刻不对你的生活进行无情的干预，强迫你作出这样的反应。办学困难要你解决，学生被捕要你营救（余修被捕是先生积极营救出来



的)……。面对这些问题，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会作出迥然不同的答案。富于正义感同情心的检斋先生则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终于投身于追求光明的风暴之中。先生的弟弟承侃、承传对先生的为人，曾在谏词中作了这样的评论：「家兄朴质粹淳，不慕荣利。外浑涵，而内崖岸峭鯁，不可挠屈。」我认为这是得当的。

还可以举件小事来说明他的严肃认真。先生本来喜好打麻将，这在旧社会本来是无足道的小事。后来章太炎知道了，一九一九年写信劝他：「博戏虽无伤，然习之久，费日耗资，亦甚无谓！」「足下长年有智，岂可随此波流？欲断此习，当以事类相近者移之，如围棋蹴鞠之流是也。」先生后来果然改变成两个嗜好，一是下围棋，二是看篮、排球赛。他常去下围棋的地方，是宣武门内海丰轩茶馆。当他思想转变之后，他连围棋也不下了，但他仍是海丰轩的常客，泡杯茶、吸支雪茄，独自坐在那里读马列主义著作。看书倦了就看看别人下棋。为了避人耳目和家人干扰，他也常用这个地方和友人、学生谈话。

此外，我认为先生作为章太炎的学生，也接受了章太炎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反满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定影响。

真理一旦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始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传播，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一普遍真理同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在中国扎了根，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被纷繁的事变冲击得困惑莫解的人，如